

汉语文化教学与 传统文化传承研究


张文平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汉语文化教学与传统 文化传承研究

张文平 /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文化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研究 / 张文平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 2018. 6

ISBN 978-7-5580-4684-1

I . ①汉… II . ①张… III . ①中华文化—教学研究

IV .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1027 号

责任编辑 曹昌虹

封面设计 李霞

责任监印 蒋璟

书 名 汉语文化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研究

著 者 张文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印 刷 深圳市彩之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8.5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80-4684-1

定 价 35.00 元

销售部电话 010-64215835-801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64215835-801

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多极化发展阶段，各国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充分展示着自己的民族力量，而在综合实力的竞争之中，文化的竞争将会成为未来最为基本的竞争。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未来承载重任的中学生，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学校是传承优秀文化的基础，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中学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人生阶段，要加大中学生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力度。汉语文化教育工作者要从日常的教学中渗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自觉地融入中学生的血液，让传统文化形成全民凝聚力和团结一致谋发展的力量。加强中学生文化传统课程，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式，构建专属于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境界。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时代步伐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尊重历史，用进步、发展的眼光去学习、去理解、去传承、去发展。

本书共五章，包括汉语文化教学基础研究，传统文化与中学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在联系，汉语文教师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通过汉语文教学案例探讨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等。本书理论性和实用性较强，通过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且提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创新传统文化传承新模式，可以指导中学教师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汉语文教学，引导中学生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做骄傲中国人。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期刊，在此一并致以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专家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

2018年1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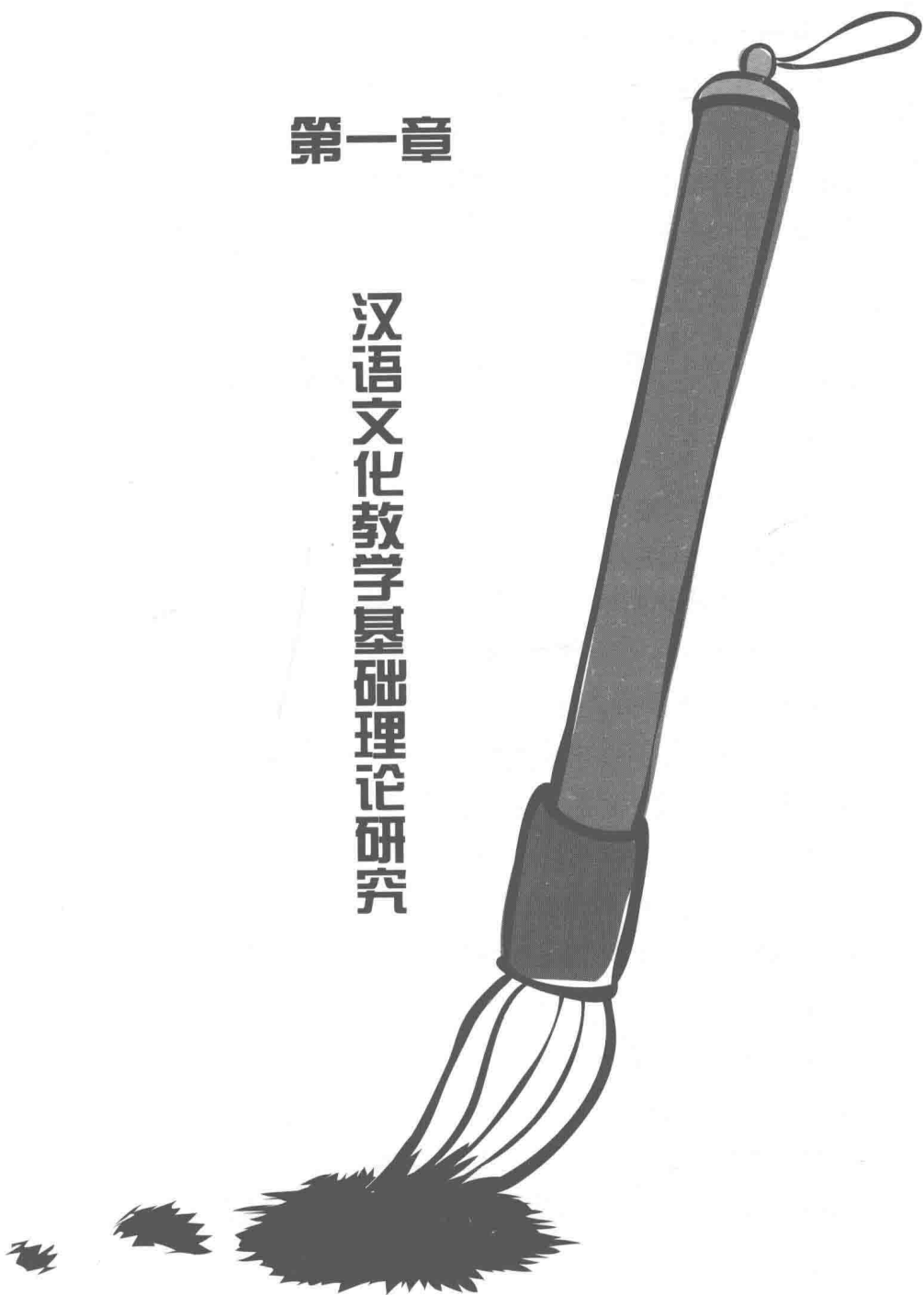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汉语文化教学基础理论研究	1
第一节 汉语文化教学的内涵	2
第二节 汉语文化教学的目标及模式研究	4
第三节 汉语文化教学的特征及内容研究	13
第二章 传统文化与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在联系	17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意义	18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汉语文化教学内涵研究	33
第三节 传统文化在汉语文化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40
第四节 我国中学生传统文化人文素养现状分析	43
第三章 传统文化融入汉语文化教学中对语文教师的要求	45
第一节 语文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体系	46
第二节 语文教师要有多元文化的积累	48
第三节 语文教师要有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的能力	53
第四节 语文教师要有拓展提高传统文化教学的能力	55



第四章 我国汉语文化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路径研究	61
第一节 培育传统文化传承的思想和理念	62
第二节 增强教材中传统文化的内容	67
第三节 构建活跃的传统文化教学气氛	76
第四节 拓展传统文化融入汉语文化教学的广度与深度	83
第五章 我国汉语文化教学传统文化传承实践案例研究	87
第一节 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学“第一课”	88
第二节 课堂教学中的传统文化传承	92
第三节 写作教学中的传统文化传承	94
第四节 现代信息技术下的传统文化传承	104
第五节 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传统文化传承	107
参考文献	123

第一章

汉语文化教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绝不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尺度来确认的，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竞争，那就是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在文化心态、修养、能力和思维方式、价值观、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竞争。汉语文教育不仅在传递延续着我国许多超越时代而相对稳定的优秀文化内容，而且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文化，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根基。现代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培养中学生语文素养，提倡人文精神，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今天，中学汉语文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汉语文化教学的内涵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对学生识字与写字教学十分重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规定：“认识 3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并具体提出每一个阶段要达到的目标。如 (1—2) 年级识字与写字目标是：“(1) 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2) 认识常用汉字 1600—1800 个，其中 800—1000 个会写；(3)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把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4) 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5) 学习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6) 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能用音序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学习独立识字。”

斯大林说：“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结合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做胜利斗争并达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①有了语言，人类才可相互交流，才可以进入组织的社会生活，成为‘文化’的人。但失去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恩格斯说：“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

①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②文字的发明是历史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是教育史上一个突破性时代的诞生。文字是文化的产物，文字作为记录语言工具，是文化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遗产都是靠语言文字记载下来，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现代广大语文教育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传承了传统形、音、义识字教学的一般方法和技能，而且针对儿童的年龄、生理、心理特征以及接受知识的特点，创造性地设计了许多生动活泼的识字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知识。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兴趣是一种情绪激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脑细胞的活动加快，神经紧张。因而，感知力和理解力以及记忆力都处在最佳发挥状态。这就是学生识字的最佳状态。霍老师改变抽象说教的教学方法，化抽象为形象，给学生一种新鲜感，让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对吸收新知识表现出优势的兴奋中心，学生不仅乐学、易记，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思路，丰富了想象，孕育了创造思维的萌芽。

传统的语言教育包括句子训练和作文训练。句子训练是通过属对训练来实现的，属对训练是一种充分注意汉字汉语特点的语言训练。属对训练的字数由少到多，先是一个字，再是多个字，直至成句。如《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人间清暑殿对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对一园春雨杏花红”，等等。对字义、字音、平仄、词性、语法、逻辑等多项内容熟练而严格的运用，音节整齐、节律感强，对仗工整，是中国传统骈体文、律诗等写作教育的必经过程。

传统的作文训练是与大量阅读结合在一起的。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学馆以经学家郑玄所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经籍为教本，称为“五经”，以后历代相传。宋代建立了理学，由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历经多年不变。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和清代吴调侯、吴楚材编选的《古文观止》是文选本教材之开端。内容大部分虽未摆脱儒家经典的窠臼，但唐代

^② 马克思，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韩愈兴起的古文运动，清初启蒙学者讲经世如沈归愚的词章之学，姚鼐桐城派古文等一些新的主张也在课致用，程教材上反映出来。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语文教育中重文言轻现代文的做法和作文中文言文脱节的严重后果。作文教育沦为科举考试的附用，模仿八股的这种僵化的痼疾，至今还在一部分人身上未能根治。但是古人重视作文训练规律的研究，“习字演文”的教学，属对、临摹、先放后收、词意并重、多做多改，如宋陈道师说：“永叔（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唐彪更是劝勉于教导之中：“文章不能一做便佳，须频改之，方入妙耳。”等等。至今对我们的作文教学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

第二节 汉语文化教学的目标及模式研究

语文教育自在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高素质人才系统工程中，起着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特殊作用。因为作为承传优秀，语文教育正是通过提高未来建设者的文化素养和能力水平，来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民族的根是民族文化素质，民族文化素质的根是语文素质所以语文素质理应是‘民族的根之根’”。^③这就揭示了，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而更好地弘扬先进主流文化，鉴古知来，教育后代，这责任历史地落在语文教育的肩上。本节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挖掘中学汉语文化教学的目标。

传统文化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人类价值，即人类在宇宙之中的价值。第二是人格价值，即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具有什么价值。第三，如何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即一个人怎样生活才算是个有价值的人。什么样的价值观便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观。两者是相互作用，互相联系的。现代语文教育对传统的人和人格价值的选择。

③ 庄文中. 高中语文教学改革和制订教学大纲[J]. 语文字应用, 1995(2).



一、人类价值的问题，亦即人在天地间的位置

天地之间，物类纷繁，古代人称为万物。人在万物中居最贵的地位。《孝经》引述，孔子言：“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论人之所以为贵最为明确。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有子·王制》），荀子之所以认为人为贵，是因为人有道德意识。而周敦颐、邵雍主要从人的智能超过万物来肯定人的价值的。周在《太极图说》中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也认为：“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得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道家崇尚“自然”，但也承认人在天地之间有重要地位。老子以人为四大之一，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肯定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优异地位。一个人如能实行道德，就有崇高的价值。因此，便有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活着要有所建树，首先在于树立品德，其次才是树立功绩，最后就是树立言论。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实际上就是先人们实践自己人格价值的写照。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肯定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诸如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教育方式，人们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人们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等等，使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必然烙上时代的印痕、阶级的烙印以及个人的色彩。而社会的发展又使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使历史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距离感，使当今的人们对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容易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产生一种排拒的心理。同时，社会的进步也使人们的各种观念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这就使得今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很难与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契合。不管是两者的本质、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会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即既要讲清两者的区别，又要讲清两者之间



的相互联系；既要讲清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又要讲清传统人生观、价值观的合理内核。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把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渗透到青少年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中去，使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培养和树立青少年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另一角度看，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们既然承认文化的承传性和发展的连续性，承认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承认传统文化在今日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实际影响，那么同样地也就无法否认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今日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影响。须知这里讲的，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既不是弘扬朱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极端自私的人生哲学，也不是庄周那种消极无为，只求个人长生久远、全性保真的处世哲学，更不是秦桧那种为求个人的富贵利达而把江山社稷拱手送人的汉奸哲学。理所当然，对于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认识与评价，并在青少年一代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史记·屈原列传》，这是屈原一生的记载，也是屈原光辉人格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屈原的人生观、价值观。屈原以出号令；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旧时代，作为臣子要建功立业，取得君王信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屈原在得到怀王信任的情况下，“造为宪令”，制定新的法令、法律，准备实行政治改革。如果没有上官大夫的进谗，如果怀王不中途变卦，改革将可顺利进行，楚国的复兴与强大也就指日可待，那么屈原的政治抱负即可实现，他即可在其中建立功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本传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屈原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另外，关于他的“自投汨罗以死”是否有价值的问题，这是自汉以来就存在争议的：贾谊、司马迁、王逸、钟嵘等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苏轼更认为这是为了唤醒怀王和国人；但扬雄、班固、颜之推等却予以否定。用今人的眼光看，屈原是在郢都沦陷，君臣流亡的情况下，深感楚国复兴无望，自己的“美政”理想已破灭时才赴水而死的，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殉国、殉道，这是一种伟大崇高的牺牲精神，值得大歌大颂。这种主动选择死亡的价值，已经从后世人民于端午之日划龙舟、吃粽了的纪念活动中得到了证明。不过，关于屈原“举



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人格精神，倒是应该加以分析：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由此而发展到清高、孤傲，与世人格格不入，这就未见得有好处了。屈原作品中孤独、寂寞意识，那种孤军奋战，独立难支的境况，不能不说与这种“独清”“独醒”的人格精神有关。此外，屈原把他对楚国的爱过多地同他对楚王的忠联系在一起，把“美政”理想的实现过多地寄希望于楚国，也都表现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上可以看出，屈原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也是伟大的；但从具体方面看，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些东西也并不可取。又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李白诗中的浪漫主义杰作，但诗的后一段也突出地反映了诗人的人格精神和人生观。自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为后人所击节称叹的，因为这两句表现了诗人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表现了旧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对自身人格的珍视。但这一段前面所说的“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问题就复杂多了，需作细致的分析。这里既涉及诗人的人生观，又涉及诗人的宗教思想。“世间”二句承前段后四句“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这四句意思是说，梦中的天姥山如此之美，令人神往，可一旦醒来，一切成空，仙境化为乌有。这里紧接着说“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显然是感叹古往今来的世间行乐既如美梦惊醒，一切成空；又如东逝的流水，去而不返。不过请注意，诗人作这种感叹，并非说不要行乐，而是说要抓紧时间及时乐，不然时光易逝，想行乐也来不及了。那么如何行乐呢？这就“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像神仙一样与白鹿为伴，时将白鹿放于青崖绿水之间，要寻访名山大川时就骑上白鹿尽情游乐。这里当然有追求个人自由的积极因素，但也包含着超尘出世、远离尘世，追求神仙境界的消极思想。李白不像杜甫对世事那样执着，他虽有过“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但自被“赐金归山”以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向求仙访道，优讲山水；他本就崇信道教，与道往来密切，又“游神仙”“学击剑”，俨然像个道士。因此，诗中的确反映了诗人崇信道教，向往神仙的思想倾向。从本诗的最后七句可以看出，一方面李白有着蔑视权贵，向往自由珍



视自我，维护个人人格独立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诗中也的确反映了诗人及时行乐，崇信道教，向往神仙，超脱人世的消极人生观。对于前者，我们自应给予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吸收。对于后者，虽应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分析，但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放弃社会责任，而又近乎虚幻的人生态度，在今日社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倡的，否则将会把青少年引向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邪路。

前面所提的屈原、李白、文天祥、谭嗣同等为什么能流芳百世，是因为他们死后灵魂得以永生。历史是无限的线，他们以人格的永恒从属于自己的小段线中跳出来，伴着历史的长度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灭，而获得历史生命的永生。现代语文在教育过程中对他们人格精神的彰显，丰富了他们生命中难以估量的价值，渗透给下代思想意识中，提升了整个社会人群的道德与理想水准，这也就是现代语文教育的价值贡献。

二、现代语文教学对教材中传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挖掘

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在与社会接触中，经历人生过程中，也逐渐体悟，认识了人生，逐渐懂得了真善美与假丑恶。语文教材中荟萃了许多古代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的事迹，他们闪光的人生，有着令人敬佩的人格情操，他们用自己的卓杰之行树立起堪为楷模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值得青少年借鉴的正确的人格标准和价值理念，隐伏在教学内容的语言文字中，需要语文教师透过文字表层，对其思想内涵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以求达到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例如：爱国诗人陆游以抗金复国为己任，期盼在抗金复国大业中立下殊勋，扬名于后世。他在《神君歌》（谒英显庙作）中唱道：“呜呼，生不封侯死庙食，丈人岂得抱志常默默！”诗人希望自己生能封侯，死能庙食，而不愿怀抱大志而默默死去。

宋末抗元爱国志士文天祥则更以其生命谱写了一曲“正气歌”，为山河添色，为日月增辉，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声名。他的《过零丁洋》诗唱出了古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如黄钟、大吕



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激励后世爱国志士为正义事业而斗争，为国家兴盛而献身。此时诗人已为元军所俘，由于他矢志不降，免不了被敌人杀害。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没有半点遗憾和恐惧，想到的是要用自己的堂堂正气、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壮丽的一笔，在青史上留下光辉的名字。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这种为了国家和民族而英勇献身的死，自然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彭端淑的《为学》，讲的是两个和尚打赌，其中的贫和尚立誓要凭空钵从庙里走到南海，富者不相信，然而年后贫者果然从南海回来，富者深感惭愧。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再难的事，只要立志，不折不挠，勇往直前，就能成功。《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成了古代仁人志士优良传统。激励人们勇敢地肩负起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对于《曹刿论战》一文，人们多从用原则和战略、战术思想的角度去认识。其本文也反映了古代有志之士的人生观。曹刿本是位普通士人，可当听说齐师进攻本国的时候，他主动要求觐见鲁生公，指陈方略。这一举动表明，曹刿对于国家命运是时常关注的，表现了曹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严肃的责任感，可以说这正是曹刿“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价值观的体现。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封建时代为臣者的必读之文。本文不仅反映了封建时代的为臣之道。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诸葛亮感人的人格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文章表现了诸葛亮对先主刘备及蜀汉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文章还渗透了诸葛亮对国事的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文章开头就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指出当时蜀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后面则对后主刘禅反复叮咛、嘱托，要他处理国事，谨慎用人，并一再陈述心迹，表达对国事的忧虑。可以说，这种对国事的深切关心，对事业的无限忠诚的无私奉献精神，既是作者光辉峻洁人格的体现，又反映了古代仁人志士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还体现了古代志士仁人的奋发进取精神。这些难道不值得后人效仿吗？

梁启超的《谭嗣同》一文，高度赞扬了谭嗣同锐意变法，改革时政的精神，日夜奔走，殚精竭思的爱国热诚，义无反顾，从容赴死的英雄气概。尤其是他



被捕前对日本友人讲的那番掷地有声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确乎铮铮铁骨，凛凛正气，完全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教徒式的布道精神。这种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变法成功和国运昌盛的牺牲精神，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这种把人生目的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生观，自是崇高而伟大的。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是一封训斥儿子的家书。书中专讲俭与奢的问题，作者主张俭以持家，俭以兴家，而奢者败家、亡家；认为俭是一种美德，古之做人君子多行节俭，而奢则是败亡之道，古之仁人君子多不取，故反复叮咛儿子要以俭治家。节俭虽是一种品德，但却涉及人的价值观、幸福观的问题，不可小视。人生在世，是否只有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才算幸福，才算有价值，才算活得有意义，这个问题自古及今人们的看法就不一样：凡品德高尚者多以俭为荣，以奢为耻，生活上厉行节俭，为人处世亦多有节操；凡品德低下者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生活奢华铺张，为人处世亦少有节操。从历史上看，生活上的俭与奢也往往关于一个人的大节，节俭者多忧国忧民之士，多能临难不有；奢华者多纨绔膏粱之子，多不守操行。所以，本文所论事小，所指事大，关乎人的品德、情操、理想、事业，实在不可小视。

《孟子》中的《鱼我所欲也》讲的舍生取义问题，本属人的品格、节操范围，但仔细一想，也涉及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人格价值本就少不了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注重人格尊严的人必然注意道义，绝不至于为了一时物欲而舍弃道义，丢掉自己的人格尊严；反之，那些没有独立人格，轻视人格敷衍的人，必然视道义为无物，在义、利而前做出错误选择，为了一时之物欲而舍弃道义，丢掉自己的人格尊严。一个人生观庸俗、鄙陋之人是很难在义、利面前做出正确选择的。对于青少年一代来说，义、利之辩证是要讲的，羞恶之心还是要的，不然，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无从讲起。

欧阳修的《伶官传序》虽是一篇史论，但对人们思考人生却很有借鉴和启示意义。这篇文章所论后唐庄宗的兴亡盛衰与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相吻合：后唐庄宗的前段可说是“生于忧患”，故能报父仇，建功业，创立后唐；



后段则是“死于安乐”，由于一味逸乐，失去进取精神，结果身死国灭。这就用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人生在世不可没有忧患意识，不可没有进取精神：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就会追求逸乐，就会失去进取心，弄不好还会给自己带来祸患。

《荆轲刺秦王》是《战国策》中非常精彩的一段文章，写的是荆轲替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失败的悲壮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观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荆轲慷慨入秦，欲谋刺秦王，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因为燕太子待荆轲不可谓不厚，“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此种厚恩大德使荆轲感恩不已；而秦既是燕之国仇，又是太子丹的个人之仇，因此他选择了替燕太子丹谋刺秦王的方式。这种“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观念，在旧时代不少士人的头脑中成为一种为人处世的准则，并往往成为君臣关系中的新的行动准则，即“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其中虽然有着太多的个人色彩，但对士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其影响又确实很深，所以我们在探讨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时，不能不给予密切关注。

《后汉书》中的《张衡传》记载的是我因东汉时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张衡的事迹。从文中既可看到张衡的文学业绩和科学业绩，还可看到他的高尚人格以及人生态度。张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谦和、正直、高洁。难能可贵的是，张衡淡于名利“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累召不应”，远与当时人对做官趋之若鹜可谓大异其趣；他“不慕当世”，不喜欢攀附权贵，这表明其人品的正直、高洁；他为河间相，政绩斐然，却“上书乞骸骨”，要求辞官归乡，主动放弃升官的机会，亦表现其淡于功名利禄。作为封建士大夫能如此看破世情，清于名利，而一旦为官，又能勤政、廉政，除了人品的正直、高洁之外，还表明他具有“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襟怀。

以上例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代士人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忧国忧民，终身以国家民族和人民为念；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理想追求，